

楊 俊

1951年5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持續半年之久的批判《武訓傳》運動，是新中國思想文化界第一個重大事件，也是開國以後毛澤東對思想、文化界展開的一系列批判運動的發軔。關於這次影響深遠的批判運動，當前的研究成果已經很豐富了，但這些研究主要是探討批判運動的原因、影響和性質，而對於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決策過程，雖然也都作了一些介紹，但都還沒有一個較為完整且詳盡的歷史考察。對於已然逝去的批判《武訓傳》運動，我們現在公認批判的確是「粗暴的」和「片面的」，但歷史研究不僅僅是討論事件的結局和定性（當然這也是重要的），也要探索事件產生過程。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k Jackson）的話來說：「在目前這個語境裏，真正有意義的不是譴責中心主體及其意識形態，而是研究它的歷史形成、它的確立或作為幻景的實際構成，而這種幻景顯然也是某種方式的客觀現實。」¹。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的深入貫徹，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允許重新解釋的環境；同時一大批文獻檔案、當事人的回憶錄、傳記和訪談錄相繼問世，這些史料包含了實質性的新材料，使得我們現在可以對這一段歷史予以新的概括和闡述，把研究引向深入。

電影《武訓傳》是在1948年7月由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制」）正式投拍的。解放後，劇本經過重大修改後，先後經過中央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管會」審查，於1950年初獲得審查通過，並於2月投入拍攝。影片於當年底全部攝製完成，很快又通過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化局的共同審查。1950年底，《武訓傳》在上海試映，隨即於1951年初在京、津、滬等地公映。

這部生產於新舊意識形態激烈轉變時期（1943-1951），跨越了兩個時代的影片，在建國前後，製片方進行了重大的劇本修改，加入了許多「把解放前反動政權壓制下，許多不准說的對話和不准明顯地表現的革命行動明朗化起來」的內容。但這種把「中國人民革命的內容」嫁接到原主題的結果，實際效果上既削弱了對原主題的表現，又呈現出對新意識形態的「相違」和抵牾。²

由此，從一開始，包括夏衍等文藝界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人，對此時拍攝此片有所疑慮³。劇本和影片最終都順利通過審查，這與當時「新民主主義」政治大背景，以及為了「驅除西方電影」而制定的相對寬鬆的電影政策等因素緊密相關；在人事因素上，或多或少基於該影片的創作、製作和審查的中央領導和部門領導周恩來、胡喬木、周揚、夏衍等，都堅持奉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路線，對原國統區知識份子的文藝作品，採取了以「團結」為主，「改造」為輔的慎重的方針。所以，他們儘管提出過修改意見，但沒有否定該影片的製作。1951年2月，孫瑜

帶著影片《武訓傳》的拷貝到北京請周恩來等領導審看。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朱德、胡喬木、茅盾、袁牧之等百餘位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此片，「大廳裏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放映後沒有提甚麼意見。

據孫瑜等人的回憶，江青與毛澤東當晚沒有去看，幾天後調看的。⁴那麼，毛澤東看《武訓傳》後有甚麼樣的反應呢？由於還沒有其他當事人的回憶資料問世，我們唯一可以見到的是當事人江青的說法。江青事後的描述有不同的版本，其一是在「文革」中，她在不同場合多次繪聲繪色地描述毛澤東看電影《武訓傳》的情形：在看片的過程中，平日裏談笑風生的毛澤東一言不發，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煙。電影一完，毛澤東沒有起身，說：「再放一篇」。江青和工作人員都很奇怪，為朝鮮戰爭和「鎮反運動」等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的毛澤東從來沒有雅興把同一部電影看兩遍，當然誰也不敢問甚麼。又把電影放完，毛澤東沉思了片刻，對江青、也對在場的人說：「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又叫工作人員給他接通周恩來的電話⁵第二種版本是1974年江青在與維特克（Witke Roxane）長談時說：「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訓傳》我們倆人都不高興，主席沒有說話，我說這是改良主義的戲，主席不吭聲」⁶

江青的這些描述，其內容當然是經過重新的「建構」，但我們也可以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發現出其中所蘊涵的某些真實的元素，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有益的線索。筆者經過考證後認為，事情的經過應該是這樣的：看了《武訓傳》，毛澤東與江青「倆人都不高興」，但他們兩個人的「不高興」的緣由和處理方法，是有實質的差別的；儘管看了《武訓傳》後很不高興，毛澤東最初並沒有同意江青大張旗鼓地批判此片的意見，即「不吭聲」具體考證如下：

在建國初期，由於身體原因，加之毛澤東的嚴格要求，江青政治地位還是不高的，遠未顯山露水，但在她當時所能插上一手的電影藝術領域，許多眾人稱道的藝術成果，在她眼中都為「資產階級的」或者是「封建主義的」作品，要求進行批判⁷。在建國伊始，她就先後要求批判電影《清宮秘史》、《麗人行》，甚至於一部經毛澤東所要求拍攝、周恩來所具體貫徹、老舍執筆的《人同此心》也被她否定⁸。這次也一樣，她看過《武訓傳》以後，就稱之為「裝滿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垃圾桶」，要求毛澤東去批判。

肯定農民的革命立場，珍視農民的革命熱情，倚重農民的革命力量，是投身農民為主體的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的革命實踐的毛澤東，經過深沉的理論思考，得出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態度，同時，毛澤東也是極力主張「暴力革命」、「階級鬥爭」、「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他認為所有寄希望於既有統治階級的改良主義都是錯誤的、反動的。對《武訓傳》，毛澤東以他特有的階級敏感和政治高度，認為影片所宣揚的「讀書救窮人」，「階級合作」，「武訓向統治者乞求、下跪」等內容，實質是表現「改良主義」和「投降主義」，是「極其錯誤」的。其實質就是害怕人民革命的群眾運動，就是要求人民逃避革命的基本問題（政權問題）不談，向統治階級繳械投降。尤為嚴重的是，《武訓傳》「把武訓的革命行動明朗化」的改造，這裏面涉及到「農民革命鬥爭」、「中國歷史」和「中國民族」等新意識形態的基本問題，毛澤東認為電影對此的詮釋「完全是錯誤」的，認為是「用馬列主義外衣」對武訓及其事業進行的「包裝」，把「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暗示為武訓事業的繼承者」。毛澤東對武訓和《武訓傳》這一政治態度，在他5月20日寫的《人民日報》社論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中有充分體現：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

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武訓傳》，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

當時，中共中央執行的政治路線是按照《共同綱領》所確立的，團結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最廣泛群眾「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在此時也是抱著「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的謹慎心態。在這種背景下，作為一個擅長把握整體、講求政治策略的大政治家，在當時的「新民主主義」大政治環境下，毛澤東也不會輕易出面去批判一部具體的文藝作品。由此，儘管反對《武訓傳》這部影片所表現出的「對革命的錯誤詮釋」，但對江青要求批判此片的意見，毛澤東以「不說話」來表達自己的態度。我們從江青要求批判《清宮秘史》、《麗人行》，當時都沒有獲毛澤東支援上也可以看出毛澤東這種微妙的心態和慎重的態度。

二

毛澤東開始的不支援，江青並沒有善罷甘休，她要求主管文藝的文化部負責人周揚，批判這部「宣揚改良主義」的影片。但她的努力很不順利，「沒有一個聽她的」。⁹要求周揚等人批判碰壁後，江青開始專注有關《武訓傳》的評論文章。她是這樣敘說的：「我們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有贊成《武訓傳》的。我帶了材料到主席那裏了去，見了一面以後，他就看不見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裏來，我滿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說，我到處找你不到，你原來在搞這個。陳伯達、胡喬木路過我們那裏，主席告訴他們《武訓傳》的事應引起注意。他們回到北京後，周揚大概覺得不好過了。」¹⁰

這些帶「到主席那裏」的材料究竟是哪些呢？應該就是當時京、津、滬三大城市的一些報刊，在1951年新年前後短短的二三個月內連續發表了40多篇肯定和讚揚的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以及此時出版的有關武訓的書籍。這些材料後來被毛澤東認為是「思想混亂達到何等程度」，從而影響了毛澤東對整個事件的判斷和決策，根據5月20日的社論上開列的名單，主要的材料大致如下表：

表一：1951年3月中下旬前京、津、滬等地重要報刊所發表的歌頌文章（均被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所點名）

題目	作者	發表日期	所發刊物名稱
武訓傳（報紙連載畫傳）	孫瑜、董天野編	1950年12月14日至30日	《新聞日報》
《武訓傳》與中國的封建社會	蔣星煜	1950年12月30日	《大公報》
在困難中成長的《武訓傳》	王蓓	1950年12月30日	《大公報》
我怎樣表現武訓的「夢」	孫瑜	1950年12月30日	《新聞日報》
我是怎樣演武訓的	趙丹	1950年	《大眾電影》第9至15期
《武訓傳》觀後感	馬侶賢	1951年1月1日	《大眾電影》第14期
育才學校師生談《武訓傳》	育才師生	1951年1月1日	《大眾電影》第14期

編導《武訓傳》前後	孫瑜	1951年1月1日	《大眾電影》第14期
看了武訓傳之後的意見	戴白韜	1951年1月3日	《文匯報》
《武訓傳》半解	史果	1951年1月6日	《新民報》（晚刊）
對《武訓傳》的粗見	立行	1951年1月6日	《大公報》
看了《武訓傳》的一點體會	顧慰祖	1951年1月6日	《文匯報》
從《武訓傳》談起	王鼎成	1951年1月27日	《新聞日報》
武訓傳 電影故事	羅維	1951年2月20日	《工人日報》
我看《武訓傳》電影	李士釗	1951年2月26日	《光明日報》
武訓傳電影與武訓畫傳	長之	1951年2月26日	《光明日報》
介紹武訓畫傳	管大同	1951年2月27日	《光明日報》
武訓傳	紫光	1951年2月27日	《新民報》
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 看電影「武訓傳」有感	穀風	1951年2月27日	《新民報》
對武訓傳的意見	項若愚、魏兆蘭	1951年2月27日	《新民報》
關於電影《武訓傳》	王賡堯	1951年2月27日	《新民報》
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	董渭川	1951年2月28日	《光明日報》
《武訓傳》觀後	鳳雋	1951年3月10日	《新民報》
由武訓和周大這兩個人物談起	趙桓	1951年3月10日	《天津日報》
推薦《武訓傳》	阮丁	1951年3月19日	《進步日報》
學習武訓無條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果鴻遠	1951年3月23日	《進步日報》
《武訓傳》教育了我	步雲升	1951年3月23日	《進步日報》
《武訓傳》觀後感	文清	1951年3月23日	《進步日報》
武訓的願望實現了	夏文華	1951年3月23日	《進步日報》
論《武訓傳》	楊雨明、端木蕻良	1951年3月	《北京文藝》第2卷第1期
武訓傳 電影小說	孫瑜	1951年初	上海新亞書店
武訓畫傳	李士釗編，孫之雋繪	1951年初	上海萬葉書店
《千古奇丐》（章回小說）	柏水	1951年初	上海通聯書店

這些文章和書籍，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做了「極為誇張」的歌頌。主要表現如下：

（一）把武訓、「武訓精神」和「革命者」、「革命精神」視為一體：這些文章把武訓、陶行知等描繪成符合新意識形態的要求的「先驅人物」，看作是「中國革命」「譜系」裏的重要人物，甚至於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都是「師承他們的結果」。

（二）把影片《武訓傳》的意義與當時的「革命運動」聯繫在一起：認為影片「在解放後的新中國，應當廣為宣傳，因為這故事有非常大的教育意義。」可以「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

「剷除封建殘餘，配合土改政策。」¹¹

（三）把武訓、陶行知稱頌為「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旗幟」：這些文章，把武訓與陶行知相聯繫。把武訓視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¹²一股勁兒地說「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工作者應當以武訓為旗幟」，「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辦教育」。將陶的貢獻與毛澤東相提並論，認為「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創造起來的」。

三

上文提及建國伊始中共中央奉行的「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決不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人忘記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共產黨人的「消滅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目標」；同時，毛澤東等人對新政權當時從舊社會接收了大約200萬的各類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狀況也是充滿疑慮和警惕，認為由於他們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舊社會，其中大多數人又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觀和立場而言，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還是資產階級的，其「親美、崇美」的本質，很容易走向共產黨的反面。¹³有鑒如此，建國初，在與資產階級搞「統一戰線」，堅持「團結、利用」他們的同時，也大力對其進行「限制、改造」。而掃除「舊政權的社會基礎」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更是一個接一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目的就是為了儘快的掃除那些「國內外的敵人」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對他們進行政治 經濟 思想文化的控制，「使艾奇遜的一套無所施其伎倆」。這就為毛澤東最後改變初衷，領導發動了批判《武訓傳》運動埋下了伏筆。

據林默涵回憶：「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後，不少人說好，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裏轉來轉去，最後下決心要批判的。」¹⁴江青送的材料，正好契合了當時毛澤東對各類知識份子的政治作用和思想狀況警惕之心，契合了當時毛澤東對意識形態領域「破舊立新」工作的高度重視之心理。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些連篇累牘的頌揚武訓以及「武訓精神」文章，與電影《武訓傳》一樣，實質上都是表現出「否認階級鬥爭，不要政治鬥爭，不要武裝鬥爭，不去觸發當時人民遭受苦難的基本問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正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使得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角色的時候，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思想」在當時不僅沒有得到阻止、批判，反而受到普遍好評，並且愈演愈烈，很快就「好評如潮」，甚至於許多「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也看不出問題，也去稱讚的武訓的精神，毛澤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內」了，由此，毛澤東發出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感歎。他從《武訓傳》和對《武訓傳》的歌頌這個現象，看出了他所深為擔憂的「資產階級思想」，並沒有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消滅，仍然頑強存在，仍然很有市場、勢力和影響，這個「錯誤思想」正借武訓這個「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到處泛濫。這就不是區區一部電影的問題了，涉及到「最高的一般原則的」大問題了！對思想改造問題重視的毛澤東自然不會放任這種現象的存在。這一點毛澤東在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說得明明白白：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瞭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 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具體的反歷史的思

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毛澤東這一態度，我們可以從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的談話中得到印證，1951年5月初，鄧拓奉命在《人民日報》展開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由於他特殊的政治身份而較常人深刻的瞭解毛澤東當時發動批判的本意，他當時對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公開自我批評文章的紫光說：

毛主席認為，武訓最初是窮人，辦義學的動機也是好的；但是，後來他有了錢、有了地，就脫離了勞動人民，自己也變成地主了，不主張革地主的命了。毛主席說，武訓辦學搞的是階級調和、改良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只有人民起來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學文化的機會，中國人民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勞動下進行武裝鬥爭、暴力革命才取得了勝利，而不是靠甚麼辦義學，走教育救國、知識救國等改良主義的路。而在現在這個時候用文藝作品歌頌武訓就更不應該。¹⁵

我們同樣可以從當時毛澤東關於武訓問題的其他談話裏，也可以得到印證：1951年6月，毛澤東審閱一篇稿子時有針對性地加寫道：「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¹⁶在武訓歷史調查團出發之前，毛澤東異常明確表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麼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¹⁷

因為批判就是為了求得澄清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混亂思想」，而不是為了追究「個人責任」；也由於當時，仍然奉行建國初的「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治路線，所以，毛澤東在強調要進行嚴肅批判的同時，又要求批判運動中執行「對事不對人」政策，即對人的處理上是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

四

經過反覆考慮後，3月中下旬，毛澤東決定批判這部「不足為訓」的影片，並與《榮譽屬於誰》一起批判。毛澤東提出批判意見後，周恩來很快執行毛澤東的意見。並且在貫徹過程中，連帶做一些自我檢討，為《武訓傳》承擔責任。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1年3月24日，召集沉雁冰、陸定一、胡喬木等開會，研究加強對電影改造領導的問題，會議決定：（一）目前電影工作的中心問題是思想政治領導，為此應組織中央電影工作委員會，草擬一個關於電影工作的決定，對《武訓傳》的批評需事先與該片編劇孫瑜談通。（三）電影批評的標準，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還不宜過分強調藝術性。¹⁸另據在「文革」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工作的黎之回憶說：「有材料說：3月20日，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發出通知，決定：『以《榮譽屬於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作典型，教育電影工作幹部、文藝工作幹部和觀眾對《榮譽屬於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組織討論與批判。』」¹⁹由這些史料可見，在3月24日的會議，就是討論《武訓傳》，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對《武訓傳》進行批判，並由此提出了加強對電影工作問題的思想的領導和審查的意見。

文藝界的主管周揚得知批判《武訓傳》是毛澤東的意見後，他在當年3月召開的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批評了《武訓傳》，並開始檢討的²⁰。4月20日，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在政務院第81次政

務會議上作題為《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1951年計劃要點》的報告，再次點名批評《武訓傳》²¹。5月15日，周揚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又談到批判《榮譽屬於誰》與《武訓傳》的問題，在分析了兩部影片的錯誤後說：「那就是胡喬木同志講的，那實在是到了一個不能忍受的程度。」²²

胡喬木當時主管著宣傳、新聞、輿論工作，當毛澤東向他們表達了武訓「不足為訓」的批評意見，胡喬木則直接出面組織文章。

表二：1951年5月前京、津、滬等地重要報刊所組織發表的討論、批判文章

題目	發表時間	作者	所發表的刊物
武訓不是我們的好傳統	1951年3月25日	晴籙	《進步日報》
評《武訓傳》	1951年3月28日	時偉文	《天津日報》
小說表現歷史人物問題 《武訓傳》影片談起	1951年3月29日	言萌	《文匯報》
我看《武訓傳》	1951年3月29日	李歆	《天津日報》
《武訓傳》醜化了勞動人民	1951年3月31日	江林	《新民報》
《武訓傳》能表現我們祖先的偉大嗎？	1951年4月2日	田家美	《新民報》
我對《武訓傳》的意見	1951年4月2日	林	《光明日報》
不能接受武訓的傳統	1951年4月4日	靜知	《進步日報》
關於《武訓傳》	1951年4月4日	程慶華	《進步日報》
我對武訓的看法	1951年4月4日	恂	《進步日報》
《武訓傳》教育了我	1951年4月4日	堃瑜	《天津日報》
武訓的反抗變成了幫忙	1951年4月8日	洪都	《進步日報》
對《武訓傳》取材問題的一點意見	1951年4月8日	萬輝先	《進步日報》
關於武訓不是我們好傳統的商榷	1951年4月8日	魯男子	《進步日報》
將《武訓傳》的爭論明確起來	1951年5月5日	書亭	《人物雜誌》第6期
魯迅先生談武訓	1951年4月20日	何幹	《文藝報》4卷1期
不足為訓的武訓	1951年4月20日	賈霽	《文藝報》4卷1期
武訓在歷史上是個甚麼角色	1951年4月20日	鄧友梅	《文藝報》4卷1期

綜合起來，這些文章都按照毛澤東「不足為訓」的意見來做基本論斷，但也不是全盤否定

這些文章都認為武訓的錯誤是「對統治階級的軟弱」和「不去鬥爭」的改良主義，但也都強調，武訓的「動機當然是好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他的願望的。」文章的用語都分委婉，不潑辣，不尖銳，針對性和戰鬥性不強。所以，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正如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所說的「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這些「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文章，不僅沒有徹底否定武訓，反而在討論中被反覆質疑、反詰而顯得理屈詞窮。這在當時有選擇性地發表的討論晴籙的文章裏，就表現的很明顯：1951年4月4日，《進步日報》連續發了四篇文章來討論晴籙的文章，除了一篇文章外，其餘都對晴籙一文進行了批駁。並且針對晴籙文章認為武訓是「歪曲中國人民的鬥

爭，反現實主義的人物」，辛辣的批駁說：「哪怕成了精神病患者，凡是看過這部影片的人們總不會有這樣的觀感。因為這部影片的主題根本就不是表揚武訓的一生苦操奇行，而是說明當時封建地主階級對窮苦大眾的迫害，怎樣不允許人民有文化教養的血淚史。」²³4月8日的《進步日報》也發表了一篇反駁針對晴籜的文章，該文提出「武訓任人凌辱，竭力掙紮，是充滿反抗精神和階級仇恨的，而在天堂地域幻想鏡頭裏，也反映出武訓的恨與愛，反映出復仇翻身的思想。」²⁴

一個多月的批判證明，僅僅指出武訓「不足為訓」還遠遠不足以消弭人們對武訓的「崇敬」，「很多人跟不上」，所以，這種相對溫和的批判也是達不到特定的政治效果。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轉載批判《武訓傳》的文章所配發的編者按所說，就是：

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擁護者武訓而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所寫的評論）全部是讚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讚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注：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批判運動要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靠正常程式，以黨內通知的方式是不夠的，僅僅指出武訓「不足為訓」還遠遠不足消弭人們對武訓的「崇敬」，必須採用「非常方式」，以更大規模，更為激烈的方式進行才能奏效。

五

眼見批判的軟弱無力，人們對「武訓精神」崇拜依舊，1951年4月底，毛澤東決定親自指揮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大鬥爭」。既然這種「鈍刀子割肉」式的、小規模的、溫和的批判已經證明是達不到意義特殊的政治效果的，為此，必須上綱上線到「驚人的程度」（胡喬木），造成特殊的政治效果，並盡可能地發動更多人參與，以更大規模地教育人們、改造思想。毛澤東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鬥爭，這種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莫過於發動大規模的政治批判運動。²⁵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作為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當時宣言：「我們的語言必須是黨的語言、階級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我們的作風必須是黨的作風。這就是說，我們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都要代表黨中央。」²⁶正是《人民日報》的這種特殊性質，毛澤東選擇把《人民日報》作為批判《武訓傳》發難地，為此，需要一篇社論來破題，所以，毛澤東在此時指示胡喬木為《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在社論正式發表前，5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楊耳文章，並把「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這個多少帶有商榷味道的題目，改為更直截了當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同期重新發表魯迅的「難答的問題」，江華的「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這裏編者加了很長的按語。編者按直截了當地說出了發動批判的原因，指出影片「歌頌清朝末年的統治階級而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華民族」。

然而，胡喬木寫的社論稿子遲遲出不來，出來的稿子仍沒有達到毛澤東的要求。毛澤東於是親自把胡喬木的稿子幾乎全部改寫，只是特意留下了「一個不完全的目錄」，即保留了京、津、滬三城市的「報紙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評武訓的一

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個不完全目錄」。²⁷ 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醒目地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 武訓傳 的討論》。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更重要的是，這篇社論主體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文章簡單明快的點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並且尖銳地說明瞭開展批判《武訓傳》的原因。與社論相配合，同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用毋庸置疑的口氣，發表了號召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要求。

韋伯（Marx Web）是這樣描述政治家對意見的表達：在這種場合裏，立場鮮明甚至是一個人難以推卸的責任。這裏所用的詞語，不是科學分析的工具，而是將其他人的政治態度爭取過來的手段。他們不是為深思熟慮疏鬆土壤的鏟犁，而是對付敵手的利劍，是戰鬥的工具。²⁸這句話來形容毛澤東對文藝批判的意見表達倒有幾分相似，《人民日報》這裏的文字，沒有絲毫閃爍其辭的猶豫，鮮明、乾脆，確實有雷霆霹靂的氣勢。在這些洋溢著硝煙氣息的戰鬥檄文號召下，一場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開始了

註釋

- 1 [美]弗雷德里克 詹姆遜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139。
- 2 關於影片的這些「錯誤」，許多研究《武訓傳》的文章都實事求是的進行了分析。如王善中 武訓、電影《武訓傳》及建國初期開展的批判；戴鹿鳴、陳世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的再評價；李希凡 關於建國初期兩場文化問題大討論的是與非 等文章。
- 3 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等人審查劇本時的，均微妙地表達了認為武訓「不足為訓」、影片「不合時宜」的態度。參見夏衍：《武訓傳 事件始末》，《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2期；陸萬美：我對電影《武訓傳》的初步檢討，《文匯報》，1951年8月31日。
- 4 參見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文匯報》，1986年12月23日，第2版。
- 5 參見袁晞：《《武訓傳》批判紀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頁88-89。
- 6 張穎：《風雨往事 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107。另參見Roxane Witke, *Comrade Ch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7 1950年江青任中宣部文藝處分管電影的副處長，兼任負責電影大政方針的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
- 8 舒乙：老舍未發表的電影劇本，《電影創作》，1994年第1期。
- 9 江青說，對《武訓傳》至少要有個評論。周揚回答說，你這個人怎麼搞的，有點改良主義有甚麼不好？江青把門一關就走了說：你搞你的改良主義好了。「文革」中出品的大事記裏，姚文元在1967年發表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以及江青1974年與美國作家維特克的談話中，都是這個說法。
- 10 張穎：《風雨往事 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頁107。
- 11 孫瑜：編導《武訓傳》記，《光明日報》，1951年2月26日。
- 12 董渭川：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光明日報》，1951年2月28日。
- 13 參見陳晉：毛澤東與文化的社會主義轉變，《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14 林默涵：七年文藝戰線的一些大事（代序），《林默涵文論集（1952-1966）》（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 15 參見袁晞：《《武訓傳》批判紀事》，頁104。
- 16 毛澤東對楊耳的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一稿的修改，引自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

- 稿》，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374。
- 17 參見鍾惦棐：《起搏書》（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頁14。
- 1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頁。
- 19 黎之：《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頁。作者「文革」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工作，親身參加了一些文藝重大事件的討論和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接觸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
- 20 黎之：《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頁。
- 21 章開源、唐文權：《平凡的神聖——陶行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頁14。
- 22 周揚在《人民日報》1951年8月8日發表的《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中，提及「我在三月間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對這電影作了批評」。
- 23 程慶華：《關於〈武訓傳〉》，《進步日報》，1951年4月4日。
- 24 魯男子：《關於武訓不是我們好傳統的商榷》，《進步日報》，1951年4月8日。
- 25 正如胡喬木所評價的那樣，毛澤東相信群眾運動，「這個以農村為基礎的長期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原則和經驗，被認為是推動新社會發展的神聖而萬能的準則了。」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65。
- 26 方漢奇，陳業劭：《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頁78。
- 27 社論所點名的文章的發表時間主要是1951年前四個月，唯一例外的一篇是在5月5日發表在《人物雜誌》上署名書亭的《將〈武訓傳〉的爭論明確起來》，說明毛澤東的這個社論應該寫於5月5日之後，而從5月16日的《人民日報》所配方的關於《武訓傳》的編者按，對《武訓傳》「錯誤的」的定性為「歌頌清朝末年的統治階級而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華的民族」的措詞，與5月20日社論的一致，可以推斷社論應該早於是年5月16日寫好，故社論的完稿時期應該是5月6日至5月15日之間。
- 28 [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7。

楊 俊 浙江財經學院行政管理系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 一期 2008年2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 一期（2008年2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